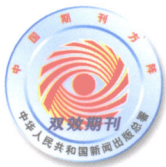


# 社会科学辑刊



2008 ..... 2

## SOCIAL SCIENCE JOURNAL

- 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 中国北方十佳优秀期刊
- 辽宁省一级期刊



专家匿名审稿制期刊



# 社会科学辑刊

2008 / 2

双月刊 总第175期

SOCIAL SCIENCE JOURNAL

ISSN 1001-6198

主管主办 辽宁社会科学院  
总编辑 高翔  
副总编辑 薛勤  
编辑出版 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创刊时间 1979年3月  
出版日期 2008年3月15日  
美术编辑 司力  
英文编校 刘瑞弘  
执行编辑 陈志刚

电子邮箱 哲 学 jikan01@163.com  
法 学 jikan02@163.com  
社 会 学 jikan03@163.com  
经 济 学 jikan04@163.com  
历 史 学 jikan05@163.com  
文 学 jikan06@163.com  
综合学科 jikan07@163.com  
总 编 辑 jikan08@163.com  
副 总 编 辑 jikan09@163.com  
编 辑 部 jikan10@163.com

地 址 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 86 号  
邮 编 110031  
电 话 (024)86120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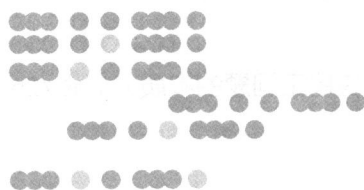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辽宁省邮政公司报刊发行公司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订 阅 处 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内代号 8-105  
国外代号 BM3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辽工商广字 0104007

印 刷 沈阳中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刊 号 ISSN 1001-6198(国际标准刊号)  
CN21-1012/C(国内统一刊号)

定 价 16.00 元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当代视角

方法论抑或存在论 / 宋友文 / 4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考  
马克思人性论的逻辑体系 / 戴景平 / 7  
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视阈的发展问题 / 王文东 / 10

现代性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 郑飞 / 14  
——青年卢卡奇哲学思想评析  
知识论中的隐喻研究 / 顾林正 / 18  
生态哲学视域:绿色科技的时代规范与研究进展 / 包庆德 / 22

从“农民”走向“公民”:农民工符号的内涵及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 张健 / 25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考察 / 李芳 张英洪 / 31  
——以土地财产权为视角  
城市发展的生态学模式研究 / 于莉 侯钧生 / 34  
政府职能社区化的问题与选择 / 卢爱国 / 37

概念整合理论的科学价值 / 马瑞香 / 40  
基于文化视角对中美教育创新激励的比较 / 李怀 张悦 / 44  
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 张应春 / 49  
——以高等教育为例

从诉讼可能性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优势 / 阎愚 / 52  
量刑功能的程序化:轻刑化的另一种思考 / 王戩 / 56  
循环经济立法价值论 / 曹锦秋 / 60  
孟德斯鸠的地理法学思想及对我国立法的影响 / 周莹 / 63  
刑事和解的理念与框架 / 张佃 徐阳 / 66  
——社会学进路的学理阐释  
论第五媒体的法律规制与完善 / 卞地诗 / 70

## 对外财政与经济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与贫困的研究述评 / 李钊 王舒健 / 73  
后WTO时代财政支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创新研究 / 张华新 林木西 / 78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宋维佳 / 82

## 制度经济学研究

我国开发区制度创新扩散的微观机理与实证分析 / 王家庭 季凯文 / 87  
政府对高科技企业资金投入的制度创新分析 / 吉亚辉 冯进 / 92  
——基于西部的研究



政府与企业管理

组织因素对公共部门管理者注意力分配  
的影响研究 / 曹大友 熊新发 /95

企业内部控制:西方的实践与中国的探究 / 白玮 赵国杰 李文慧 /99

企业生产能力选择对过度竞争现象形成的影响分析 / 蒋满元 /10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宏观政策选择 / 连家明 王丹 /107

中部崛起中的县域经济发展 / 卢珂 /111

中国体育保险发展及对策 / 李薇 /114

企业技术转移中隐性知识转化的制约因素与  
消解对策 / 徐进 李作学 王前 /118

关于构建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的思考 / 王亦虹 赵国杰 /121

论住房政策的价值冲突与平衡路径 / 张玉 /125

中国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研究 / 姜欣 /128

试论“澶渊之盟”对宋辽关系的影响 / 赵永春 /131

广州体制与澳门模式差别性研究 / 王巨新 /139

从强硬到妥协——白鹅潭事件中的英国政府 / 徐静玉 /145

从王室与苏氏之争看周王朝的王畿问题 / 于薇 /152

后秦姚氏的汉文化修养 / 戴晓刚 /157

“五四精神”与中国新文学 / 刘中树 /160

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理论中雅与俗的悬隔与汇通 / 王鍾陵 /171

“红色经典”的三个历史阶段 / 高旭国 /180

实践美学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探论 / 唐善林 /184

新实践美学:实践美学的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 岳友熙 /189

从卢照邻《乐府杂诗序》看高宗武后朝乐府诗创作  
及与唐诗发展的关系 / 张开 /194

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 / 杨再喜 /198

浪漫反讽的现代性 / 张继云 /202

文学经典的文化社会学审察 / 刘晗 /205





# 方法论抑或存在论

##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考

宋友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为特征的,它把价值理想与现实基础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种价值理想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的价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也是以它的存在论为基础的。这种存在论是基于人的价值理想诉求而展开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与发展。离开了存在论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就成为无根的浮萍。

【关键词】方法论;存在论;事实与价值

【作者简介】宋友文,1980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2-0004-03

近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并以此来拒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存在论基础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由此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与存在论的讨论。

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sup>[2]</sup>之后的《政治经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指出,对政治的批判应当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求根源,而对市民社会的探求最终诉诸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在中后期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试图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从而使对宗教的批判能够在新的理论层次上展现出来。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早期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深刻而到位的。费尔巴哈仅仅把宗教归结为世俗基础,而“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的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sup>[3]</sup>。

### 二

没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关键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方法论,甚至是一种认识的工具,这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教条化。卢卡奇就对这种倾向进行过深刻的批评:“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上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同样是自杀。”<sup>[1]</sup>我们以前就犯过这样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纯粹看成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和教条化,不但在实践上给我们的社会生活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后果,而且在理论上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誉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影响。

马克思正是靠这种方法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分裂,从中找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当然,这种经济运动规律作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是不能够被任意超越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sup>[4]</sup>在认识到这种自

在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中,存在着由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向。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早是通过宗教的批判来完成的,因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基本前提。对宗教的批判结束后,马克思就开始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

9 771001 619003

然必然性的不可完全被超越性后,马克思论述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时,仍然坚持不能彻底扬弃自然必然性。自由王国不只是代替必然王国,同时它又是把必然王国作为不可抹杀的要素保存在自己里面。而且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组织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人们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在自然必然性王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只是有限的自由,然而却是通自由王国的唯一现实的途径。

自由王国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把共产主义假定为一种理想,而是旨在详细说明这一理想得以实现的机制。具体地说,马克思通过批判的实证和实证的批判研究,透过感性的、具体的历史活动,探讨了资本运动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异化的自我扬弃的内在机制,从根源处挖掘出资本主义社会运转的秘密,最终发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可见马克思对这种机制的解释是以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为基础的。

同时,马克思是以历史的暂时性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样他也并不是用永恒的绝对的原则来描绘共产主义社会状态的。“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5〕历史即使到了共产主义那里,也并没有终结。总之,马克思把历史看做是为实现社会生活的自由即共产主义而创造条件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其核心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这种解放必须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基础之上。他进而宣称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和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而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因此,马克思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为现实的革命运动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但是,正如前面卢卡奇反思性的批评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方法论,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行动(运动)。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纯粹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看清自己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势和地位,并以此为依据作出正确的革命行动。卡尔·波普尔把马克思看待行动的态度称之为行动主义,其实在马克思的许多论述中都同样表达了其行动主义的倾向,尤其是他把社会主义设想为人们基本上将摆脱束缚他们目前生活的不合理的力量这样一个阶段。“根据马克思的一般道德和情感来判断,如果面对这样

一个选择,即‘我们是做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呢?还是满足做一个命运的预言家?’我相信他会做一个创造者,而不只是一个预言家。”〔6〕

对于波普尔的结论,我们暂且不作评论,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他提出的问题,即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阐释究竟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方法还是一种理想性的预言(信仰)?

### 三

我们知道,马克思虽然对宗教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但是并不代表马克思没有宗教情结。如果我们指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那么他的这种方法论的前提和依据是什么?这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是从马克思的“弥塞亚主义”的情结来论述的。卡尔·洛维特评论道:“在这种观念背后的现实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弥塞亚主义,它不自觉地植根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之中,植根于他的种族之中。即使他是19世纪的自由的犹太人,是坚决反宗教的,甚至是反犹太主义的,他还是一个受《旧约》局限的犹太人。从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两千年之久的经济史都无法改变的古老的弥塞亚主义和先知主义,以及犹太人对无条件正义的坚持,都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共产党宣言》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7〕

如果说以前我们强调的是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的科学论证,那么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关于共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主义基础的问题。这种理想主义基础其实也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更多的是依赖“进步”这一概念,因为我们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于是,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在这样做时,一种掩盖起来的道德因素就被引入了。据说,在把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历史进步,把社会主义设想为更高阶段时,价值判断就溜了进来。即使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和预测是正确的,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更有吸引力,是更值得向往的社会形态。因为这些都是价值判断,而从任何纯粹的事实的历史理论中并不能推导出这些价值判断。这样,马克思的方法被指责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犯了自然主义的错误。”〔8〕从本质上说,指责马克思犯了“自然主义”的错误强调的是从事实推不出价值,与指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包括弥塞亚主义)的



观点如出一辙。卢卡奇针对这种批评深刻地指出：“这样一种对经验的评价，事实上仍可能是纯主观的，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意愿，一种乌托邦。但尽管乌托邦的意愿采取的是哲学上较为客观的、较为精致的‘应该’的形式。但这种愿望决没有超越对经验的接受，并因而同时决没有超越哲学上更精致的、旨在变化的主观主义。”〔9〕黑格尔也认为：“辩证法不是主观思维外部活动，而是内容固有的灵魂，它有机地长出它的枝叶和果实来。理念的这种发展是它的理性的特有的活力，作为主观东西的思维只是袖手旁观，它不加上任何东西。”〔10〕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黑格尔式的幽灵在卢卡奇身上显现出来，以至于学者们大都认为卢卡奇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看来果不其然。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一致的地方，即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都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论证就是建立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离开了从先人为主的价值观得到的推论，从而也摆脱了任意的幻想，而把它奠定在现实主义历史观的坚实基础上。

由此而引发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价值无涉”的社会学的实证科学呢？其实，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价值预设为前提的，只不过马克思把这种价值预设建立在坚实的、具体的历史大地上。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理论，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途径，内在包含着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和道德信念两个重要因素。它不是把这两个方面看做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两种因素，而是看做其统一体中两个同等重要的、相互联系的组成部分。可见，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包括方法论）与其价值判断（预设）根本不相抵触，因此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具体、实践和现实的方式思考上述两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丁的见解不无道理。他说：“马克思使关于社会主义的宣告成为一种科学论证，他想以此证明新秩序的必然到来。这种证明的前提条件是对这种本身具有‘乌托邦’性质的科学的信仰。这种思考方

式把实证主义的态度与无意识的想象结合起来了。”〔11〕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和科学维度是统一体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可见，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充当“黑夜里的先知”的弥赛亚主义和指责马克思犯了自然主义错误的做法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与价值的有机统一为特征的，它把价值理想与现实基础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这种价值理想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论的价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也是以它的存在论为基础的。这种存在论就是基于人的价值理想的诉求而展开的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自我生成、自我创造与发展。离开了存在论的根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就成为无根的浮萍。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也应该在这种语境中重新审视。过去，我们注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方法论功能，从中抽离了存在论的根基，这样做很容易滑向教条和僵化的泥潭。当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危机，恐怕与这种存在论根基的缺失不无关系。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存在论根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之意。

### 【参考文献】

- 〔1〕〔9〕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7、242页。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 〔3〕〔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10、11页。
-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 〔6〕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2页。
- 〔7〕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3页。
- 〔8〕罗伯特·韦尔等：《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 〔10〕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8页。
- 〔11〕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87页。

【责任编辑：侯小丰】

# 马克思人性论的逻辑体系

戴景平

**【摘要】**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分别用劳动、社会关系和人的需要来界定人性或人的本质,致使人们对马克思人性论的理解发生分歧。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来把握这些论断就可以发现,这三者构成了马克思人性论的内在逻辑链条:人的需要是人从事一切生产活动的根本动因,而生产实践活动不仅实现和满足了人的需要,同时也使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得到确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关系,形成人类社会,从而在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包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内的完整的人性。

**【关键词】**人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劳动;社会关系

**【作者简介】**戴景平,1962年生,哲学博士,赤峰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内蒙古 赤峰 024000)。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2-0007-03

## 一、马克思关于人性界定的内涵

马克思首先从类的角度对人性进行了整体性的界定。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即劳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特性。“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sup>[1]</sup>在马克思看来,既能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又能产生人的各种类特性并使之得以发展的根据,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实践。人的劳动和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sup>[2]</sup>。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自由是指人作为类的存在超越于其他一切动物之上所显示的那种自由,是指人类的生产劳动。因此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一旦人的劳动失去了自由性、自觉性,这种劳动也就没有创造性,就会变成一种被迫的、痛苦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

如果仅仅停留在人的类本质的层次上,还没有达到对人性的真正理解和深刻把握。因为对类特性的认识还没有考察到具体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它撇开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不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只是从共性的角度对人性进行的抽象,还没有达到对具体群体和个体特性的认识。因此,在肯定人的类特性的前提下,马克

思又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社会关系,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即党派、民族、阶级、政治派别等方面的关系;伦理关系,即夫妻、子女、家庭、亲属等关系。现实的生活的人就是这一切关系的总和,是所有这一切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不是所有这一切社会关系的简单的、机械的算术相加的“和”,它是指以生产关系为主线,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纵横交错而织就的一张社会关系之网,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有机统一。不同阶级集团的划分、不同社会组织的差异等,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它们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决定的。因此,认识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就认识了不同的人,也就能把握了人性。

在分析了劳动和社会关系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在世界,即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唯物史观创立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sup>[3]</sup>从现实的人出发,就是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出发,



就是从现实人的实际需要出发。人的需要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了人的需要,无论怎么强调从现实出发,无论怎么声称回到现实生活中去,都会使对人性的研究陷入抽象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4〕毫无疑问,人类正是通过创造性的生命活动满足自己的需要。随着需要的不断满足以及为满足需求而创造出新的工具,又会引发进一步的需求。人类历史就是处于旧需要的满足和新需要的产生的运动之中。“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5〕人的需要是人与作为其生存条件的客观对象之间的一种依赖关系。通过对外界物质的摄取以实现自身的新陈代谢,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共同特征,人作为生命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当然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需要称之为将个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纽带,认为需要是人的一种“天然必然性”又把需要称之为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表现,认为需要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人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不断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保证人的生命活动的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又使人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丰富和深化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容。所谓人的生命活动,就是从需要到需要的满足并产生新的需要,再到新的需要的满足,这样一种连续不断、循环往复的持续发展过程。人就是以此来表现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显示人的生命活动的价值。需要使人的生命在追求中勃发,一旦认为需要满足而可以停止追求了,也就丧失了生命之源。正是需要使人有所追求,人在活动中发展起了自觉性、目的性、能动性、选择性、超越性等超生物的特性,从而使人的活动具有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根据和存在方式。

人的世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世界。它是由人的活动创造的,也会随着人的活动的超循环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这个由人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人们享用着越来越丰富和多样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展现出品位和质量越来越高、形式和内容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应地人也能使自己的规定性——人性得到丰富和发展。

## 二、马克思人性论的逻辑体系

虽然马克思分别用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界定人性,但这三者在马克思那里绝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而是以需要贯穿起来的严密完整的逻辑整体。

首先,人的需要是人的劳动的内在动力。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能动存在物,即劳动的存在物。那么,人为什么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需要是人追求自己对象的一种本质力量,是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它是主体对客体能动关系的内在化。所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利益是通过一定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现实的、具体的需要。推动人进行劳动的内在动力就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对此,英国学者莱斯利·史蒂文森评价道:“关于人性,马克思似乎至少是准备作出一般的概括,这就是,人是能动的、生产性存在,人用生产其生存手段的事实,使自身与动物区别开来。人自然是为了生存而劳动。”〔7〕

近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任何生命机体的积极性归根到底都是由它的需要引起的,并且指向于满足这些需要”〔8〕。也就是说,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正是需要。但是,需要是任何生命体都具有的,而劳动却是人所独具的活动方式。劳动或物质生产是人的一般本质。需要是人“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如果“没有需要,也就没有生产”〔9〕。由此可见,需要是劳动成为人的一般本质的深层原因。

人为了获取满足自己生命活动的物质资料,必须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人作为对象性存在物,必须与自身之外的对象发生对象性的关系,而人是通过中介与对象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这种中介就是人的劳动。借助于劳动,活动的人(主体)使自己的特性、本质和本质力量在指向活动对象(客体)的活动中以不同的方式对象化;同时又以不同的形式使活动的对象变成自己物质的和精神的的生活与活动的一部分,使自己的特性、本质和本质力量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把对象变成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从而使人的对象性的关系成为“为我”的。正是借助于劳动,活动的对象性和主体性(为我性)统一起来了。

人的劳动创造活动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基本的活动,它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前提,而它自身又以人的需要作为内在原因和根据。离开人的需要,



人的劳动创造活动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而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既能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又能产生人的各种类特性并使之得以发展的内在根据,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实践。现实的人,是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进行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又产生新的需要。在这一客观过程中,人的需要逐渐丰富、扩展,人自身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人开始摆脱束缚在身上的必然性,开始自由自觉的实践,并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应然状态。

其次,在满足需要的劳动中产生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人类社会。正是劳动使人超越其它动物而成为人。人是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则是生产劳动中分工协作的产物。“人在积极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0〕人和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是处于“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11〕,“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2〕,而社会则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众多的个人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特殊的物质机体。因此,人“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人一方面是一个个体的存在物,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机体;另一方面,任何人又不是“纯粹的个人”,而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这就是说,人同时又是一定社会的成员,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人把这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内在集于一身,成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4〕。人的二重性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无所谓社会;而社会又是各个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如果否认个人同社会的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也就否认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一般的规定本性。

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论断,只涉及

人与其它动物之间的区别,尚未涉及不同时代的人和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区别。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界定,既包括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区别,又包括同一时代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它讲的不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一般本质,而是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即人的具体本质。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它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它就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需要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定性,是被意识到了的需要,从而使需要在主体方面表现为一定的欲望、要求、动机、目的,引导人们去从事相应的实践活动,即人的需要直接导致人的创造性劳动。在满足需要的劳动中产生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人类社会,从而也形成了包括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和自然属性在内的完整的人性。这样,马克思就从人的需要出发,把劳动和社会关系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并由此形成了自己与以往所有的人性论不同的新的人性论。

#### 〔参考文献〕

- 〔1〕〔3〕〔4〕〔5〕〔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6-67、67、79、60页。
- 〔2〕〔10〕〔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24、24页。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9页。
- 〔7〕莱斯利·史蒂文森:《人性七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59页。
- 〔8〕彼得罗夫斯:《普通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6页。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4页。

〔责任编辑:无 痕〕



## 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视域的发展问题

王文东

【摘要】从实践生存论视域看,发展就是人之生存的自觉自为形态。发展并不是外在于生存,而是生存的内在特质,人们正是通过发展的方式生存。发展观与生存论紧密地关联着,不同的发展观影响着不同生存观的确立。在全球发展和后工业文明语境之中,我国新型生存方式的建构须实现和谐生存、物质和精神协调的生存、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相平衡的生存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

【关键词】发展;生存;生存方式;新型现代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ZX007)

【作者简介】王文东,1975年生,苏州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水师范学院讲师(甘肃 天水 741001)。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2-0010-04

### 一、发展的存在论本质及其与生存的关系

人的生存有两种状态:“基本存活态”和“发展态”。在实践生存论的视域中,发展并不是外在于生存的,而是生存的内在特质,人们正是通过发展的方式生存。发展与生存具有如下基本关系。

其一,“以发展求生存是人的生存区别于动物的生存的根本标志”<sup>[1]</sup>。人的生命存在不同于动物的生命存在,人是在创造、改变等生存活动中来发展自己,在发展中使自己的生命存在变成历史性的和有意义的、得到自觉澄明的存在。动物依赖和适应自然界而维持其基本的生命存活,而人则在以自己的行动改造自然界中生活。人的生存是在自觉自为中展开的,这种自觉自为的典型形态就是“发展”,所以“发展”就是人之生存的自觉自为形态。

其二,人的存在不是既成的、现成的、确定的,而是不断生成的、未定的、指向未来的、开放的,是一种可能性的、发展性的存在。人的生存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发展过程的集合体,生存内含着发展。人的生存就是不断生成、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种意义上,生存本身就具有发展的向度和特征。人是发展性生存的存在者。列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sup>[2]</sup>

第三,发展是建构人之生存的一种基本形式。海德格尔曾说:“生存问题总是只有通过生存活动

本身才能弄清楚。……追问生存的存在论结构,目的是要解析什么东西组建生存。我们把这些结构的联系叫做生存论建构。”<sup>[3]</sup>发展是人自觉开展的一种活动,它是人自觉追求生存的一种明显的确证,人通过发展而得以以“紧抓”的方式重塑着自己的生存,人的生存则通过发展的方式弄清楚。因此,发展就是此在的一种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事务”。如果没有这种事务,人的生存或许不会体现出“超越”基本存活的生命底线。恩格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们当时所居住和所适应的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他一从狭隘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通过以后的历史发展才能造成。”<sup>[4]</sup>表明人的生存状态就是由人自己在创造、发展活动中不断展现出来的。

第四,发展不是生存的目标,也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生存的内在规定性。生存的意义通过发展来展开,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构建生存的一个环节,通过发展改进生存方式,实现更高的生存价值,使生存意义在发展中得到提升。发展也不能被单纯看做手段,如果把发展视为手段,那么对其就可以取舍、选择。但人的生存就是发展性生存,生存内含着发展。离开发展,事实上就没有了与任何动物的明显区分,更谈不上人的生存了。所以,把发展看做手段或目标都是一种本质性的形而上学思维。就人的生存而言,不仅有能否生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的问题,这才是

9 771001 619003



问题的关键。发展是超越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而走向美好生活的生存方式。

## 二、发展观与人类生存的内在关联

发展观是对人之生存过程、变迁、可能性的理论提升和反映,是对发展活动的深层反思,它反过来也规定着生存观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观与发展实践经历了多次嬗变。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主—客”相关论、全球多极论直至可持续发展观,展现了发展实践引发的发展问题的深层逻辑构架。发展观的这种嬗变内在地建构着人之生存的格局。发展观与生存论紧密关联着,不同的发展观影响着不同生存观的确立。发展观的深层逻辑基础是发展实践,所以发展观的嬗变反映着参与生存建构的发展实践活动的自身变迁。但是,由于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发展观,因此,在发展观的影响下人之生存也呈现显著的差异。

### (一) 客体论发展观中生存主体的遮蔽

客体论是发展观的最初形态,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全球形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消极局面。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在以下几个方面侵蚀着人的生存:第一,以物为中心,重物轻人,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蚀了人的主体性资格,遮蔽了“此在”的生存,使人被物所役;第二,消解了人生存的多重境遇和条件。客体论发展观只注重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忽视了人生存的其它构成性因素,使生存的构成性条件单一化、片面化;第三,经济发展理论所宣扬的“增长模式”无非是“西方中心论”的价值理念,遮蔽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生存主体性资格;第四,用所谓普世的眼光套用西方模式,使生存单一化、同质化,影响了人之生存的丰富性和差异性。

### (二) 单一生存主体的确立

从客体论到主体论,是发展观演进的一次“格式塔”转变。发展主体论是以人的现代化、人的发展、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为核心的发展观,是对客体论的超越和否定。单一主体论的发展观在转变发展路向的同时也对人的生存构建产生了多重的影响。首先,它准确定位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而不是“物”,是为了“人更好地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及生活水平”,发展主体论最大的优点就是确立人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其次,人之生存变迁的主要表现就是传统型人格向现代型人格的转变,但人格现代化理论却把人的现代型转变规范成统一的模式和标准,忽视了现实人生存的历史复杂性。再

次,在全球生存格局中,以“普世”的眼光和标准来达到“主体”的同质性生存,特别是以西方的人格标准来规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格,无疑是对生存主体“差异性”、“平等性”和“多样性”的漠视,与其“发展主体”的旨趣相悖。另外,不同的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本土政治、文化环境,这些国家的生存主体深深地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不可能抛开自身的“生存境遇”去接受所谓的“普世”的现代性生存人格。离开本土、民族文化和环境等的生存也将会使人陷入新的“非主体性生存”。

### (三) “主—客”依附性生存陷阱

从“中心—边缘”的依附论到世界体系论,其发展观的共同点是从全球发展结构的角度来界定发展的可能性,是在全球空间层面上展现的“主—客”相关论。<sup>[5]</sup>“主—客”相关论中的生存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立足“主—客”关系维度看待全球生存结构。无论是依附理论还是世界体系理论,都认为发达国家在全球生存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客体地位,发展的目标就是改变“客体地位”,把客体地位上升到主体地位。这是典型的“主—客”生存格局的定位。实际上,无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生存格局的组成部分,都应有平等的生存主体资格,只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剥削和压迫,把不发达国家变成“客体”的从属地位,扼杀了不发达国家更好的生存机会和可能性。第二,依附性生存。这两种理论揭示了全球生存秩序中的不平等性、不平衡性和现实发展差距。发达国家以其早发现代化的经济、技术优势,凌驾于不发达国家之上,把不发达国家作为资源地加以控制和掠夺,造成发达国家的强势生存和不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弱势生存。第三,低度生存。“低度生存”现象是在依附性经济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造成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环境恶化,生活水平低下,社会极度不公,贫富分化严重,文化教育落后。发达国家“良好的生存”正是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生存为代价的。因此不发达国家要实现自身自主、自立、自强的生存,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

### (四) 多极主体差异生存观的发现

弗朗索瓦·佩鲁在克服原有发展观缺陷的基础上提出“整体的”、“综合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体现在现代性问题上就是强调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各个因素诸如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等方面都不能



局部、片面地进行,而应该整体、综合、全面地推进,使社会结构间、各变量间、各要素间相互联系、紧密配合,防止“无发展的增长”和片面、单一的发展。多极主体发展观中人的生存体现为:第一,人类正在走向多极主体的差异性生存。与西方普世主义价值观不同的是,佩鲁和亨廷顿等人坚持世界的差异性、多极性。全球存在不同的文明主体,只有承认主体差异性,才能正视全球生存的现实,也只有不同文明主体间展开对话、交流和交往才能推动国际生存秩序向积极、良好的态势发展。就一国内部而言,生存应在多维的层面展开,既要实现国内部不同的地区、民族、人群的发展,又要实现各个发展变量的同步发展。第二,生存文化或文明的差异是各主体在生存向上最根本的差异。与物质财富和制度设施对于世界生存主体的基本构成性相比,文化和文明是更基础、更根本、更深厚的历史性嵌入的差异。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的生存,其生存是“先天地”被嵌入“文明的历史”之中。第三,世界生存主体有强弱之分,但没有优劣之别。不同的生存者在全球展开交往、对话或冲突,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各民族必须在和其他民族、文明的交往中进行生存,“交往”就构成了生存活动的基础。也只有通过这种交往活动,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到当代全球化的生存格局。第四,多元差异主体的交往使得处于强势的西方文明也可以以此为反省的契机,检视自身文明的不足。

### (五) 可持续论域中的多元主体际生存的建构

从可持续发展观看来,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核心是存在两个不断扩大的差距,即人与自然的差距以及“南北”贫富之间的差距。〔6〕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追求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观所说的代内(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代际(当代人与下代人)体现了“主体际”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的关系是主—客关系,所以形成以自然界为中介的“主—客—主”关系。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人类生存特质:第一,可持续生存。所谓可持续性生存是指人类通过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节约能源,减少浪费,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倡导生态经济,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在社会方面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免受暴力侵害的公平社会环境,创造美好、健康、自我价值实现的生活,使得代内代际的生存都

能持续下去。第二,主体际生存。可持续性就是要保证各主体的持续共存,这里的生存主体既包括当代人又包括后代人,既有发达国家更指发展中国家。由于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的差距,保持可持续性生存可能呈现巨大的主体差异性,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在符合人类共同生存利益的前提下,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通过主体间的共识实现人类可持续生存。第三,和谐共生。《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从广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是要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在考虑和谋划自己的生存时,都能考虑到其他人(包括后代人)及生态环境,并能真诚地以“和谐共生”的旨趣生存,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持一种良好互动的和谐共生关系。第四,公平生存。这里的公平是指生存机会的平等性。公平生存就要求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要给后代人的生存留有空间和可能性,而公平生存在传统发展模式中被忽视了。无论是代内公平还是代际公平,在当今社会都没有被重视。发达国家的穷奢极欲、富裕丰盈和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物质匮乏形成鲜明对比,一国内部有产者的享乐和无产者的穷苦并存已成不争的事实,而当代各国在很长历史时期以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破坏了环境,危害了生态,涸竭了能源,使后代人的生存受到很大影响,现实的教训使可持续发展把公平生存原则写进人的生存观念之中。

### 三、当代中国发展语境中新型生存方式的建构

其一,和谐生存。和谐生存是相对于经典现代化时期敌对式生存而言的。经典现代化时期由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双重作用,在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上是对抗式的征服与被征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结果造成了生态危机;在人与人、社会各主体间、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是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从而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冲突乃至战争。而新型生存方式就要改变这种敌对的状态,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

其二,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平衡的生存。古代社会处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乏之中。进入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享乐于物的世界,结果造成人对物的依赖,物的丰裕和精神的匮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道德滑坡,精神沦丧,犯罪频发,文化颓废,使人们的精神处于极度萎靡状态。而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既要弥补物质财富的不足,又要满足人民日益

9 771001 619003



增长的文化精神需求,并保持二者的合理平衡,否则就会陷入启蒙现代化的旧的陷阱。

其三,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得益彰的生存。理性原则是启蒙时期的核心原则,它包括工具、形式、科技理性向度和人文、价值、实质理性向度。旧现代化过程就是在科技、形式、工具理性主导下推进的过程,形式、科技和工具理性凌驾于实质、人文、价值理性之上,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都被工具化倾向所主宰,人们的生存被物化、工具化,生存环境失去了和谐。韦伯就人的生存合理性问题,提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前者讲求可计算性、效率原则,后者讲求伦理、判断、政治承诺等价值原则。但现代化的经济理性和政治科层官僚制等都是在“形式合理性”的主导下推进的,所以现代化使人生存在被祛魅后的“铁笼”之中。要重建美好的人类生存方式,必须重建这一分裂了的理性,使人在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双重合理向度的指导中生存。

最后,构建自觉自为基础之上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生存方式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而生产方式又是人类“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人的生活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进行的,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尽管生产方式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自

觉利用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构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也自觉地构建自己的生存方式。构建生存方式就要科学地规划和设定生存的前景,即构建“什么样”的生活问题。人不仅仅是“经济人”,而且是“政治人”、“社会人”、“理想人”,这就要求不能把人的生存简单地限定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某一方面,而要综合、全面地发展,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主张的,将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其最高生存形式。对于当前现实中国,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其实质都是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

#### 【参考文献】

- [1]郭祥才:《走出生存与发展关系的困惑——从发展形态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 [2]《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29页。
-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5页。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36-537页。
- [5]任平主编:《全球发展:理论与模式与选择》,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 [6]M·梅萨里维克等:《人类处于转折点》,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责任编辑:李凡】



# 现代性辩证法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青年卢卡奇哲学思想评析

郑 飞

**【摘 要】**青年卢卡奇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现代性辩证法而出现的,为我们揭示出历史本身从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运动过程。他的这种现代性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认知层面上的现代性批判话语,更包含着本体层面上的某种超越机制。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维度方面,卢卡奇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而其现代性批判只有置于整体的现代性辩证法理论中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如果将现代性辩证法理解为一个整体的东西,那么现代性批判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由于卢卡奇的现代性辩证法是以思辨的方式来完成的,他的“阶级意识”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为我们上演了一个阶级的精神成长历程,这就注定了“物化”理论的失败。

**【关键词】**卢卡奇;现代性辩证法;现代性批判;“物化”

**【作者简介】**郑飞,1982年生,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8)02-0014-04

《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被誉为“卢卡奇通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典范”<sup>[1]</sup>。该篇围绕“物化”的出现、展开以及扬弃进行研究。青年卢卡奇通过“物化”理论第一次全面地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某种不同于马克思的关于现代性的“诊疗方案”,为我们呈现出一套相对完满的现代性辩证法。<sup>①</sup>我们知道,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或其“现代性诊断”,所指向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必然性,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而不是像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是开展一种话语批判。在笔者看来,卢卡奇哲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现代性辩证法而出现的。尽管其辩证法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困难,但在复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维度方面卢卡奇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而其现代性批判,只有置于整体的现代性辩证法理论中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

“物化”理论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的。青年卢卡奇认为只有深入到商品关系的结构之中,才能发现一切对象化形式和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他提出商品结构的本质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

掩盖了社会关系的本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也就是出现了“物化现象”。卢卡奇在援引《资本论》中关于“物化”现象描述的基础上<sup>[2]</sup>,提出“物化”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这在客观上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世界,在主观上表现为人的活动本身也变成一种商品。

青年卢卡奇对商品“物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生产过程领域,并没有沿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方向来展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无论是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都为商品的形式所制约。客观方面,不同商品的形式相同性在于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产物;主观方面,抽象劳动的形式相同性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卢卡奇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为中介,发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形式合理化因素。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入手将抽象劳动理解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从中抽绎出根据计算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与之对应的现代劳动过程、分工等社会关系领域的问题则不在他的考察之列。以合理化原则反观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形式合理化的因素在不断增加,而人的“质的特性”却逐渐被消除。卢

<sup>①</sup>正是借助于辩证法,卢卡奇才完成其现代性研究。“现代性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主义的主客体辩证法,即历史本身从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运动。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才以“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作为副标题。

9 771001 619003



卡奇在这里发现的合理化原则,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关系的“座架”,这是他用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

正是这种生产过程领域的合理化原则,使得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第一,在客体方面,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破坏了产品本身有机的统一性,使得劳动过程变成纯粹是由计算决定的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消除了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第二,在主体方面,生产的主体随之也被分解为许多部分,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丧失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逐渐丧失意志。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形式合理化不仅影响到经济生活,还波及到政治生活和思想意识。源于工厂内部组织形式的合理化逐步扩展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

青年卢卡奇以合理化的视角洞察资本主义,揭示出其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将现代性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他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现代资本主义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甚至法官像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就从下面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现代官僚统治意味着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以及意识类似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社会—经济前提,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中,虽然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且合乎规律的必然性,但是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

商品生产方式中的“物化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物化意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嵌入人的意识里,形成“物化意识”,甚至影响到社会科学的研究。卢卡奇以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为例,指出“物化意识”使资产阶级学者陷入物化的直接性,非但不能从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深入到物化

的根本现象,反而使这些空洞的表现形式永久化。

青年卢卡奇从商品生产方式出发,分析了“物化”是如何全面地侵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这种研究不仅是一种事实上的分析,更包含着一种价值上的批判。“物化”通过商品拜物教和合理化的双重视角来展开现代性批判,这种双重视角的语境转换是以马克思对劳动的“抽象化”为中介来实现的。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把资本主义的合理理解物化,“同时从物化和合理化双重角度来考察社会劳动领域与生活世界语境的分离过程”〔3〕。

## 二

既然卢卡奇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分析中,辩证地说明了“物化意识”的现实根源,那么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就不仅贯穿生产过程始终,而且在近代思想意识的进程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得以全面展开。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形式合理性概念在商品形式与康德所分析的知性认识形式之间构成一座“桥梁”。

近代哲学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康德的“自在之物”这一概念。“自在之物”一方面作为认识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认识的最终对象,构成认识形式的界限。这就使理性主义对于感性内容与知性形式之间关系的处理出现了问题,即不能把概念内容“溶化”为理性,使得感性内容的存在成为完全不可溶化的既定事实。如果形式不足以囊括内容,经验事实不能为我们的知性所构造,建立哲学体系就成为一个难题。青年卢卡奇指出,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矛盾和悲剧正是在于不再把每一个既定的事实当作不存在的东西,让它们消失在由知性创造的理性形式的宏伟建筑后面,而是把握住了概念的既定内容的非理性特征,超越和克服这种证明,力求建立体系,这样就把形式和内容的逻辑对立推向极点。

后康德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仍然围绕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展开思考,试图消解“自在之物”。费希特将“自我”设定为全部内容的创造者,消除了主体和客体的二重性。他的这种统一表现为“活动”的产物,实际上是把实践、行为、活动作为全部同一哲学的方法论中心。席勒把美学原则规定为“游戏冲动”,认为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使美学原则远远地超出了美学的范围,被设定为塑造客观现实的原则。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现出德国古典哲学在解决“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



反”这一问题上的最高成就。在《逻辑学》中,辩证法从直接性的存在论开始,经由间接性,即矛盾对立发展的本质论,最后在概念论中实现了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种统一性的实现得益于某种历史性原则的引入。只有在概念论中当实体即是主体的时候,主体达到了自我意识,同时既是辩证过程的创造者又是产物,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等等对立的扬弃的问题才可以被看做是解决了。然而,黑格尔的历史生成性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因而不具有现实性;主体只是在一个由它自己创造的、它本身就是其意识形式的世界中运动。他没有在历史本身之中发现和指出同一的主体一客体,而是被迫超越历史,并在历史的彼岸建立自我发现的理性的王国,并从这一理性王国出发,将历史把握为阶段,将出路把握为“理性的狡黠”,只能在绝对精神中,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达到顶峰。黑格尔解决近代哲学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矛盾的尝试之所以失败,并不在于他假定了同一的主体一客体,而在于他不能把主体一客体的同一性置于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因此只能沦为概念的“神话”。

青年卢卡奇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的二律背反,指出这种二律背反深深地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物化结构”。“古典哲学在发展史上处于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的目的是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思辨地复活在这个社会中被这个社会毁灭了的人,然而其结果只是达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只有这种推演的方式,即辩证的方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sup>[4]</sup>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没有最终解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却为我们留下了辩证法的遗产。要想真正地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物化”,不能仅仅满足于在理论范围内单纯从方法上来超越,必须在历史中寻求一种现实的超越。

### 三

青年卢卡奇不但揭示出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思想意识中的“物化”,而且给出了克服“物化”的现实途径。

无产阶级自身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能够超越资产阶级思想的直接性。同样是面对社会生活全面“物化”的事实,资产阶级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看到自身强大的证明;无产阶级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正是由于二者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不

同地位,造成了资产阶级只能看到现象层面的直接性,不能洞察到隐藏在“物化”现象背后的被颠倒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则能运用中介范畴,通过某种科学的抽象,达到对直接性的克服。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历史现实性本身只能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才能被达到,如果看不到更多的中介,就不可能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和产生把握为同一主体的产物,也就不能发现同一的主体一客体。

由于无产阶级能够成为历史过程的同一的主体一客体,青年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视为克服“物化”的现实出路。历史的同一的主体一客体在无产阶级那里表现为一种现实性:一方面,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是作为社会事件的纯粹客体而出现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他们被迫沦为过程的客体,忍受着商品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能够达到自我意识,发现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体。只有当工人认清自己和资本的关系,才能理解自己的社会存在,洞察商品结构的拜物教形式,使自身的客体地位发生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在卢卡奇看来,虽然工人在“物化”过程中变为商品,但他的灵魂的本质却并不认同这种商品化的过程,甚至在内心深处反对这种奴役状态。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商品生产是一种颠倒性的结构,其实自己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体,就能克服“物化”,形成革命的阶级意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才开始真正地作为阶级而存在。

应该说,阶级意识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言导致工人的赤贫化,继而引发世界革命,相反,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致使工人日趋保守,以至丧失革命意志。工人运动越来越倾向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进行合法化斗争。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面临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国际对马克思做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他们认定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自然“进化”,这种“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泛滥。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强化,直接针对的就是上述的第二国际后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阿格尔认为“物化”理论是为解释欧洲两个国际的失败而在理论和政治上所进行的一种尝试。

9 771001 619003